

# 迎見破曉天光的社會學開創者： 評《不待黃昏的貓頭鷹》

陳東升

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不待黃昏的貓頭鷹：陳紹馨的學術生命與台灣研究》，鄭力軒著，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22年9月，376頁。

《不待黃昏的貓頭鷹》一書透過非常周延的史料蒐集與深度訪談，清楚地呈現台灣第一位社會學家陳紹馨先生的學術生命歷程。自此，過去台灣社會學界對於陳紹馨片段且零碎的了解，終於不再是遺憾。其次，藉由豐富的紀錄和深入解析，本書將一直都是伏流的陳紹馨的學術貢獻，連結到台灣社會學發展的歷史，突破1949年橋接中國社會學的理解框架，更完整地闡述台灣社會學發展的全貌，讓那些沒有被訴說的歷史內容有機會展現出來，這也是對於台灣社會學歷史的重新理解與自我轉化。最後，本書透過陳紹馨對於社會學古典的市民社會理論研究、分析台灣社會天命思想與宗族組織的轉變、探討日治時新文學的興起、解析台灣死亡率和生育率的人口結構轉型，系統性地闡釋陳紹馨所提出台灣現代性研究的整體分析框架，並且透過陳紹馨分散在不同階段的研究主題來論證日治中期展開的台灣社會現代性發展歷程，突破了1990年代台灣人文社會科學社群討論陳紹馨時強調的「台灣本土研究的提倡者，而非台灣現代社會科學的創建者」（頁5）框架，更精確地定位陳紹馨先生對台灣社會科學發展的貢獻。

## 不再被拒絕的社會學家

第一，這本書對於我們了解陳紹馨學術思想形成的歷史過程有相當重大的啟發，作者以相對完整的資料來說明陳紹馨每個生命階段所發生的事件，一些我們過去沒有掌握到的社會連結和轉變，都因此得以透過作者所蒐集、整理的素材來理解。例如，陳紹馨和林茂生之間的師生關係，始自於日本殖民政府為了回應台灣人對於進階教育的需求，所設立專門錄取台灣學生的台南商業專門學校。陳紹馨通過嚴格考試順利進入就讀，而林茂生則是該校的英文教師，教導學生閱讀許多重要的文學和哲學的經典作品，促使日治時期台灣社會領導階層的年輕成員注意到民主自由的思想。這段時間的知識學習，也養成陳紹馨對於新文學和社會學的興趣，並且參加台灣文化協會的社會學知識傳播工作（頁 47-53）。高校時代的深厚情誼奠定了兩位傑出的學術工作者長期合作的基礎，因此日本戰敗後，林茂生和陳紹馨受命接收台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並受聘為台灣大學文學院教授並不是偶然。其後，林茂生因為淡水中學學生參與武裝事件而被逮捕槍決，也可以藉由兩人的深厚情誼，合理推測此事件對陳紹馨的學術研究轉向經驗主義，帶來相當程度的影響。

陳紹馨在台南商業專門學校就讀時對於文學就有相當濃厚的興趣，也和學弟吳新榮交好，後來在日本大學就讀又結識賴和、楊雲萍與陳虛谷等人，逐漸建立他和台灣新文學圈廣泛的人脈關係。在 1930 年代台灣文學界對於台灣文學定位的論辯中，是以比較隱晦的方式否定台灣文學是母國延伸的文學，並且主張以台灣為主體的台灣文學，這也是陳紹馨所採取的立場（頁 136-144）。當前學界在回顧日治時期的鄉土文學辯論時，很少有人提到陳紹馨先生所扮演的角色，而這是本書另外一個重要的發現，顯現出陳紹馨跨領域學術討論參與的深度。

日治時期陳紹馨的人際關係必定會連結到日本社會菁英。廣受台灣留日學生敬重的自由民權學者吉野造作是新明正道的老師，陳紹馨在日本時期接觸到吉野的作品，促使他選擇進入東北大學追隨新明攻

讀社會學。新明正道全力栽培陳紹馨，讓他畢業後留任學校擔任正職助手（頁 73-75）。不過陳紹馨隨後放棄東北大學的教職，於 1936 年返回台灣並於父親在高雄大樹開設的農場任職。後來農場經營遭遇到困難，他於 1942 年受聘到台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研究室，和當時的日籍教授金關丈夫、馬淵東一、國分直一、岡田謙等人發展長期的學術合作關係（頁 115-132）。1945 年後，部分台北帝國大學的人類學者受聘替美國情報單位進行社會調查（中生勝美 2020: 140），透過日本同僚的引介，陳紹馨也於 1953 年和美國共同安全署在台灣進行城鄉調查（頁 208）。這樣的學術合作關係提供了陳紹馨先生在戒嚴時期相當程度的安全保障空間，讓他可以針對台灣本土社會的各項研究主題進行資料蒐集與研究工作，對於他系統性地開展各項社會學主題經驗研究有著關鍵的作用，顯示出威權體制統治下的學術研究者，只能在美國等外援組織的支持下進行具有國際意義的本土議題研究。

陳紹馨於 1940 年參與皇民奉公會，並擔任負責生育與人口議題的厚生委員會委員，此經驗引發他日後對於人口問題的研究興趣（頁 122）。1947 年陳紹馨在《台灣文化》發表他的第一篇人口學論文：〈台灣死亡現象之社會學的考察〉（頁 175）。由於人口學和台灣研究的成果受到美國學術界的重視，他逐漸發展出和美國重要學者的學術合作關係。1948 年美國人口學家諾特斯坦與陶柏到台灣考察，拜會陳紹馨等三位台大教授。1950 年代諾特斯坦規劃的紐約人口局在台灣主要的合作對象就是陳紹馨（頁 205-207）。紐約人口局不但補助陳紹馨於 1957 年進行本土生育調查，並於 1959 年資助他前往普林斯頓大學人口中心學術研究一年。在美國進修期間，陳紹馨結識哥倫比亞大學人類學家傅瑞德（頁 252），除了指導傅瑞德的學生葛伯納在台灣進行田野研究，完成彰化新興村的民族誌研究外，他也和傅瑞德向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申請資助〈台灣人口與姓氏的分布〉研究計畫（頁 258-260）。英國學者傅利曼 1962 年回顧中國社會學發展時，在台灣學者部分僅提及陳紹馨，彰顯出陳紹馨在全球社會科學的學術地位。雖然陳紹馨在台灣學術社群處於邊緣的位置，但是基於他優異

的學術研究成果所建立的學術合作關係，進一步讓他得到英美學術研究者的高度肯定（頁 253-254），這是邊緣學術研究者主動改變劣勢學術地位的作法。然而，對比於國際讚譽，國內對陳紹馨冷淡的評價顯現出台灣社會學術評量的標準受到學術社群成員組成因素和各種行政組織的干預。

第二，本書對於台灣社會學歷史的理解開展了一個新的架構。過去介紹台灣社會學的發展歷程時，因為戒嚴時期禁止讚頌殖民統治者的成就，往往會忽略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對於戰後社會變遷產生的作用，再加上社會學會和各大學社會學系的歷史書寫模式都是以嫁接到 1949 年，隨著國民黨政府遷徙到台灣創立學術機構學者的學科理論發展觀點為主，所以完全忽略了日治時期社會學的發展和陳紹馨在 1945 年以後對社會現象研究所累積的成果，以及這些成果對於台灣社會學發展的重要性。蕭新煌（1987）回顧 30 年來的台灣社會學發展，是以中國大陸社會學發展經驗為起點，連結到移居到台灣的大陸籍社會學者對於台灣社會學學術社群的貢獻，文中雖然提到陳紹馨先生，但是並未討論他的學術研究及其對台灣社會學的影響。即便蕭新煌提到〈台灣之都市社會經濟調查〉一文，但並沒有具體討論陳紹馨在這個調查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藉由這項調查的資料分析結果，彰顯他在社會變遷和社會階層研究的卓越貢獻，而這正是本書所補足的重點（頁 213-223）。我曾在討論社會學六十年來在台灣的發展時以 1945 年為起點，區分為重建與模仿期、制度鞏固期、反省與多元化的展開、本土化的挑戰期、蓬勃發展期等階段，對於 1945 年以前台灣社會學的狀況，以及創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系的陳紹馨先生對於台灣社會學發展的貢獻則顯少著墨（陳東升 2011）。間隔十年後綜合探討台大社會學系的歷史發展過程，雖然比較龍冠海和陳紹馨對台灣社會研究的觀點，但對於陳紹馨的貢獻還是侷限在〈中國社會文化研究的實驗室：台灣〉一文（陳東升 2020），未能深刻地闡釋他對於台灣社會現代性理論發展所達到的成就。

第三，任何一個社會的轉變必須要完整地考量這個社會的歷史

進程，無法排除特定歷史階段的影響。以吳聰敏（2004）研究台灣經濟發展為例，他提出一個基本的問題：如果沒有經歷過日本殖民政府的統治，台灣國民平均所得在 1980 年代會是多少？他透過統計資料推論，應該會等同於中國改革開放之前的金額。這說明了日本殖民政府在經濟發展政策上對於提高台灣民眾所得所做出的貢獻，然而，這並不是殖民統治者基於維護台灣民眾的福祉而推動各項政策產生的後果，反而是為了統治者的需求所造成的未預期後果。陳紹馨對於日治時期台灣民眾死亡率和生育率的研究，顯示日本殖民政府公共衛生措施的成功外，台灣民眾在傳統天命價值的改變，進而接受西方醫療、教育和農業生產耕作方式等都是降低死亡率的關鍵因素（頁 223-224）。更重要的是，台灣民眾和在台日本人相比較，死亡率高出兩倍以上，而且在台日本人的死亡率在 1937 年已經比日本本土還低，是全世界死亡率最低的區域（頁 179）。這樣的結論顯示，雖然殖民統治提升了台灣民眾的醫療健康，但是殖民者所得到的獲益更大。

另一方面，日治時期死亡率和生育率轉變的社會基礎必定會延續到 1945 年以後，陳紹馨就指出台灣生育率在 1950 年代（日治最後階段）已經開始下降，因為當時的台灣社會已經逐漸擺脫傳統生死注定或是多子多孫的天命思想，因此，如果 1960 年代以後的生育率隨著都市化程度的快速提升，而持續下降，就可以推論此現象是日治時期的公衛政策所造成的影響。基於這樣的研究成果，推論生育率在部分家庭會隨著態度改變和都市化而下降，因此陳紹馨主張有限的節育，而不是全面的節育。充分探討一個社會的歷史發展過程，可以幫助研究者了解過去的社會結構對於後續社會變遷可能產生的作用，並且適切地修正從其他國家引進的政策建議。

台灣社會人口學的研究如果沒有將日治時期的人口轉型和死亡率研究納入討論，必然是殘缺不全的，無法了解這個學科的發展，以及對於整體社會人口結構轉變的機制。探討 1945 年以後台灣社會人口變化，若忽略日治時期已經發生的轉變，就會將當時威權國家推動的節育政策視為關鍵因素，而無法掌握到日本殖民政府的醫療衛生政策

所造成的影響，以及台灣民眾在民族政治運動和新學藝的傳播下，逐漸發展出不同於傳統文化的價值態度，都是促成死亡和生育行為改變的重要因素。據此來推論，台灣社會學的歷史如果沒有將日治時期相關社會現象的研究和討論涵蓋進來，便無法完整地顯現出理論發展的軌跡，並且失去從台灣社會的視角來闡釋社會學研究的重要性。

最後，根據本書所提出的論點，陳紹馨畢生學術研究的母題就是台灣社會現代性（頁 9），以台灣殖民社會變遷的經驗來回應古典社會學核心研究議題。主要是因為陳紹馨在東北大學受到完整且紮實的古典社會學理論訓練，充分掌握歐洲學者對於主權國家興起、工業革命和資本主義的發展、公民社會的形成對於當時社會所造成衝擊的知識探究。在日治時期的台灣社會學者就能夠以這麼宏觀的理論課題來貫穿其學術生涯各式各樣的研究，是非常難得的學術成就，即便是 1960 年代以後的社會學研究者也少有人能以一個基本理論架構來統整自己的各種不同研究議題。更重要的是，陳紹馨注意到，台灣現代性的研究有其自然存在的重要性，特別是其形構建立在殖民統治的不對稱權力關係上，因此，相較於歐美社會更遠的時間點，會受到在地社會經濟與政治條件的影響，展現出不同的變遷軌跡。陳紹馨各項的研究都是以台灣現代性形成為核心，將經驗研究和理論進行系統性整合，這些成果奠定台灣社會學本土研究的基礎，應該也是陳紹馨的研究在 1990 年代以後廣泛受到台灣社會學社群引用的重要原因。

就如同美國社會學家 Morris（2015）在 2015 年出版美國第一位非洲裔社會學家 W. E. B. Du Bois 的深度分析傳記，《被拒絕的學者：W. E. B. Du Bois 與現代社會學的誕生》。這個作品有系統地分析 Du Bois 在種族隔離的美國社會即便有卓越的學術成就仍然無法進入美國主流的大學，只能到美國南方非洲裔學生就讀的大學任教和進行研究，但是在艱困的學術環境下，Du Bois 透過紮實的課程和執行持續經驗研究，培養出許多傑出的非洲裔社會學者，並且發表品質良好與數量龐大的種族不平等相關學術研究，創建了美國社會學主流歷史中忽略的亞特蘭大學派。以學術研究的成果和學術研究人才的培

育，Du Bois 的亞特蘭大學派可以和全球學術社群所熟知的芝加哥學派相互比擬，但是前者鮮為人知。Du Bois 的知識體系和學術開創成就，在美國社會學界也是一股伏流，直到二十一世紀才重新被全球社會學知識社群理解和肯認。

在台灣和美國兩國，社會學開創期都同時出現伏流，這絕對不是偶然，而是充分展現社會學知識體系的發展和社會學歷史的撰寫，都是鑲嵌在既有的社會、經濟和政治權力脈絡上。在種族或族群不平等的權力支配關係下，屬於被支配與殖民的群體成員所提出的研究成果和理論發現，通常無法在當時成為主流，必須要依附優勢群體成員的論點，採取所謂客觀中立的普遍科學主義標準，彈性調整自己的研究問題和學術領域，以得到主流學術社群成員的支持和協助，再逐漸透過研究知識的累積來發展一套論述並改變不平等的社會政治權力關係。另外，弱勢群體會避免正面挑戰主流群體和統治者的統治權力，改而採取一種比較隱晦的方式來進行，因此即便是在一個極端不平等的政治脅迫結構下，高度被支配的弱勢群體學術研究者仍然能夠發展出抵抗的策略，從組織和參與公民團體、創辦媒介傳遞知識觀點、培育新世代的研究者、建立從被支配者觀點的學術研究平台等行動，雖然無法立刻改變社會不平等的現況，卻可以造成未來長期深遠的影響。

### 陳紹馨社會學理論存在的緊張關係與可能的出路

接下來，本文將針對《不待黃昏的貓頭鷹》這本書的書寫內容提出一些可以討論的議題。本書引用知識社會學與歷史社會學的取徑來探究陳紹馨的思想與研究（頁 11），強調在研究者自身的理論形成過程中，特定知識場域中文獻、理念和研究者之間的交互作用關係所造成的影響，因此讀者期待的是一個針對知識場域中不同因素動態交織而形構的生命史，但是書中的章節卻以編年史的時序來組織，所以陳紹馨不同時期的思想轉變似乎就只能單向地順著時間的推移而進展。1942 年陳紹馨進入台北帝大土俗人種研究室，重回學術界之

後，他的研究重心也從歐洲思想轉向台灣社會研究（頁 118），作者並未透過系統性的分析來說明這個重要的轉折，而是直接進入討論陳紹馨和當時台灣知識分子參與辦理《民俗台灣》的理論立場、知識論辯和台灣人知識社群經營的貢獻。此外，1950 年代到經驗主義之路，可能受到歷史資料蒐集範圍和內容的限制，作者也只提到白色恐怖和政治迫害事件的壓力，以及台灣學者被邊緣化的影響，再加上陳紹馨和美國學者的社會連結，讓他理解到的社會調查應用在歐美社會學知識發展是一個普遍趨勢。作者如果針對陳紹馨從巨觀理論研究轉向經驗世界的生活素材和人口數量資料的研究進行深度且動態的探究，以及兩個時期轉向的比較分析，可以更清楚地顯現出政治權力的壓迫和社會經濟外在條件的運作，當時的學術社群互動的思想交流和主導知識典範，具有客觀性的學術研究當成抵抗統治者的策略選擇（頁 133-134）等三個重要因素是如何影響學術工作者研究取徑的轉變，並且更完整呈現外部政經因素與知識社群內部因素在不同時期造成研究者轉向的相對重要性，就可以顯示採取歷史社會學分析取徑的必要性。

本書討論陳紹馨學術發展歷程時，針對他社會學理論觀點的轉變，以及轉變所產生的矛盾，如果可以更細膩地闡釋，對於讀者在理解上比較不會造成困擾；如果能夠系統性地將陳紹馨理論和研究成果連結到 1960 年代以後社會學重要議題的知識建構，對台灣社會學知識發展就有更高的參考價值。第一個議題是抽象理論和經驗研究的矛盾，或者說理性主義和經驗主義的矛盾。這是一個在社會學領域長久且持續討論的問題（Mills 1959; Bourdieu, Chamboredon and Passeron 1991），而陳紹馨從古典社會學理論之子轉變到社會調查的經驗研究就是一個非常好的案例，促發我們討論解決理論與經驗研究矛盾的可能方式。從經驗主義的角度來說，本書作者提到，「他（陳紹馨）認為理論必須經過經驗資料的測試驗證」（頁 283），更引用美國學者傅瑞德的悼念文來強調陳紹馨經驗主義的堅定立場。傅瑞德寫到：「雖然在理論方面也有精深的研究，但他絕對不為了理論而棄絕事

實。他毋寧是隨時準備放棄任何理論，倘若這些理論經過他用科學發現那些不符合事實真相」（頁 245）。另一方面，陳紹馨的理論發展，特別是市民社會的概念形成，在東北大學就學和教學階段比較接近 Bourdieu 等人的應用理性主義的立場，先建構市民社會的核心概念，再透過英國和德國國家建立的不同歷史過程來確認市民社會在兩個國家所具備的不同意涵（頁 98-99）；後續他的討論稍微觸及到社會階層的轉變、日治時期社會運動和新學藝出現對於台灣市民社會形成所造成的影響，如果他繼續深入論證則有可能建構完整的台灣市民社會的概念，那就不是一種素樸的經驗主義，而是比較接近應用理性主義的立場。這一個理論取徑在陳紹馨轉向民俗學和人口學研究後就較少應用，因此這樣的知識立場並沒有持續且連貫地展現在陳紹馨的現代性理論發展過程中。

晚近社會學的發展，值得注意的是社會持續組裝論的立場。這個理論主張不同類型的行動者在網絡的連結過程中產生各式各樣的中介、轉譯、配置，因此社會實體的存在是變動的，Latour（2007）認為要深度描述和掌握這些行動者的連結和作用關係，而不是套用一個預先擬定的理論框架來理解社會現象，否則將會產生許多限制，這是研究者要意識到的理論建構的基本問題。林文源（2014: 48-49）引用社會持續組裝論的觀點，指出理論和經驗世界是相互構成的，理論概念也是構成社會實體的一部分，理論與經驗世界不應該是二元區分、對立的，這是經驗主義和應用理性主義以外的第三條出路。

第二個值得深入討論的議題是，台灣社會現代化的獨特性和同一性的緊張關係。作者提到陳紹馨的觀點是，如果歐美社會的現代化進程是特殊的歷史發展結果，那麼台灣和日本社會的現代化也就同樣是獨特的（頁 102）。無庸置疑，與歐洲社會由民眾促成的現代化過程截然不同，台灣的現代化進程是在日治時期由日本殖民政府由上往下推動的（頁 222）。此外，台灣社會獨特的現代性內涵也有別於中國混雜的社會結構和文化內涵，展現在大航海時期以來，受到荷蘭人和西班牙人統治、與南洋地區的貿易往來、明鄭治理、被清朝納入國家

版圖等多重機制上（頁 57）。台灣在長期歷史發展過程中發展出不同於西方現代化的經驗，應該就是構成陳紹馨在〈中國社會文化研究的實驗室：台灣〉一文論證台灣不是中國替代品，而是具有獨特理論意涵的基礎。

陳紹馨的研究並非去歷史化的，而是將一個社會歷史變化的過程納入分析的架構中（頁 303），他批評以西方一般性原理作為社會科學的基礎（頁 134-135, 150），也掌握到統治者使用一般性理論（進化論和優生學）來貶低被統治的台灣人，製造對台灣人偏見的現象。他因此主張要站在統治者的對立面來同理性地理解在地文化的獨特性，強調異民族的理解應將這個社會當成獨特存在的實體去探究其社會運作機制（頁 135）。台灣文學就像台灣研究一樣是為台灣而生的（頁 146），不是母國延伸的外地文學。這種強調在地獨特性的知識立場表現在他反對不分鄉村和都市地區普遍節育方案（頁 240），或是 1950 年代台灣和中國移居群體在不同現代化階段造成雙方的衝突（頁 165-167）。

另外一方面，雖然陳紹馨注意到過度應用一般性理論會讓日本人將台灣視為進化的後段成員而合理化其優勢統治的正當性（頁 134），但他的台灣現代性形成之理論框架卻相當程度採取同一性或是普遍性的階段發展論，指出現代性有階段性和最終的演進目的。陳紹馨（1979: 495）指出台灣的社會整合分別是依據血緣的部落社會、地緣關係的俗民社會、社會功能分化與合作的市民社會。如果依照民間組織的型態和參與程度、社會態度和價值、血緣和地緣關係的重要性來評估，日治時期日本殖民政府所推動台灣社會的現代化，在一定程度上已經進入市民社會的階段（頁 263），但市民社會自主性仍然偏低。相對來說，1945 年以後的台灣社會已發展到由民眾自主參與民間組織、擁有地方選舉的投票權、推動工業化，以及逐漸都市化，使得台灣的現代化進展在遠東地區達到相當成熟的市民社會階段（陳紹馨 1979: 515-523）。這樣的觀點是建立在功能論自然演化的基礎上（陳東升 2009；鄭力軒 2022: 42），即便陳紹馨在理論上一定程度強

調現代性歷史化與多樣化，但不同社會終究會進入到類似的社會變遷終點，所以作者提到，「陳紹馨承襲古典社會學對現代性的立場，將在地民俗的世界視為現代性下終將消失的前身」（頁 151）。

功能論是日治時期的台灣文化和社會研究主流，伊能嘉矩則是代表性的研究者（陳偉智 2022: 271-272）。陳紹馨相當了解伊能的論點，再加上精研黑格爾的哲學（黃柏誠 2018: 234-239）對於黑格爾的歷史哲學<sup>1</sup> 論述有相當程度的了解，因此他接受這一套歷史觀，並對於台灣社會從過去到現在的社會變遷採取一種演進的觀點應該也是可以理解的。以這種知識系譜和所處時代主流理論的考察方式，可以更為完整地理解陳紹馨的理論形成過程，並且在反省與評述他社會變遷理論限制時，注意到學術社群對於黑格爾和伊能嘉矩的批判論點是否也適用於陳紹馨的論點。

1945 年二戰結束後，因為對日本發動戰爭侵略中國而產生的罪惡感，日本學者開始對日本帝國主義進行思想上的反省，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竹內好（2007）、溝口雄三（1999）和子安宣邦（2008），雖然他們並不一定是日本中國研究的主流。他們對於中國（或台灣）的理解不是從歐美國家的知識或是文明標準出發，而是從這個研究對象的歷史變遷經驗來探究中國或是台灣可能會是什麼，而不是將中國或台灣歸類於落後且不文明的範疇中。因此，台灣或是中國的發展在其獨特的歷史條件下，有可能得以透過與歐美各國的交織互動，採取不同於文化進化論的行動路徑。

台灣的學術社群也有從世界史（全球）的角度來理解台灣的主張，以及分析台灣和世界不同社會交纏關係的想法。例如，台灣史學者曹永和（2000）就前瞻地提出立足世界的台灣島史研究框架，然而其中台灣（島嶼）透過海洋對外的連結促成台灣社會各項變遷的影響，以及台灣對於海域串連的社群和地區的作用較少被討論，卻是理

---

1 「現代化以前的情形已經消失。這是歷史哲學家黑格爾所指明的事實」（陳紹馨 1979: 6）。

解台灣相當重要的一個面向。史書美 (Shi 2018: 211) 提到透過歷史和地理學研究的影響，提出方法論上關係性比較的概念，強調不是將一個社會或地方當成孤立的個案，而是會和其他社會在時間和空間上產生關聯的場域，再選擇出兩組關聯性的場域進行比較分析。她引用地理學家 Hart 的論點指出，「台灣不是一個個案，也不是一個普遍作用過程的變異體。台灣是一個在全球歷史地理交互連結情境下，可以串聯其他空間但又具有獨特性的節點，她也是一個製造全球化過程的場域，而不只是全球化的接受者。」既然台灣是作用者也是接受者，就顯示台灣是一個變動的存在實體，對外的連結持續對台灣產生作用，而台灣發生的事情也對全球產生影響，交互串聯造成相互影響。兩種論點都是站在世界的角度來理解台灣，台灣多面向連結的觀點就不會只聚焦在權力核心國家的影響，忽略其他連結的可能性和重要性。無論是日本的中國研究或是台灣研究學術社群，顯然都不是採取普遍的階段論和目的論的觀點也不是強調獨特性，而是強調交織性和關係性。

對於陳紹馨學術研究的貢獻，除了呈現他本身的成就外，本書如果可以進一步討論他台灣社會現代性理論所牽涉到的重要社會學理論課題，並且連結到當代台灣研究社群對於理論和經驗研究的緊張關係，以及台灣研究的定位，那麼就可以完整地顯現出台灣知識發展的系譜，深度地展現陳紹馨的研究在當代的理論意義，對於台灣知識社群建構將會更有啟發性。

### 參考文獻

- 子安宣邦，2008，《東亞儒學：批判與方法》。台北：台灣大學出版中心。
- 竹內好，2007，〈作為方法的亞洲〉。《台灣社會研究季刊》6: 231-251。
- 中生勝美，2020，〈戰後日本の人類学史(1)〉。《社会科学研究》1: 139-160。
- 林文源，2014，《看不見的行動能力：從行動者網路到位移理論》。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 吳聰敏，2004，〈從平均每人所得的變動看台灣長期的經濟發展〉。《經濟論文

- 叢刊》32(3): 293-320。
- 陳偉智，2022，《伊能嘉矩：台灣歷史民族誌的展開（增訂版）》。台北：台灣大學出版中心。
- 陳東升，2009，〈台灣社會組織原則的轉換：衝突或自然演化？〉。《長庚人文社會學報》2(2): 247-274。
- ，2011，〈六十年來社會學在台灣的發展：制度建立與研究領域的變遷〉。見林建甫編，《海峽兩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1949-2009）下》，頁 31-7。台北：台灣大學出版中心。
- ，2020，〈專業組織的持續組裝與知識創新：台灣大學社會學系 60 年的變遷〉。《台灣社會學》39: 167-192。
- 陳紹馨，1979，《台灣的人口變遷與社會變遷》。台北：聯經。
- 溝口雄三，1999，《做為方法的中國》。台北：國立編譯館。
- 黃柏誠，2018，〈陳紹馨的〈黑格爾市民社會的成立〉一文與「作為中國社會文化研究實驗室的台灣」之概念〉。見洪子偉、鄧敦民編，《啟蒙與反叛：台灣哲學的百年浪潮》，頁 205-257。台北：台灣大學出版中心。
- 曹永和，2000，《台灣早期歷史研究續集》。台北：聯經。
- 蕭新煌，1987，〈三十年來台灣的社會學發展〉。見賴澤涵編，《三十年來我國人文及社會科學之回顧與展望》，頁 327-390。台北：東大圖書。
- Bourdieu, Pierre, Jean-Claude Chamboredon, and Jean-Claude Passeron. 1991. *The Craft of Sociology: Epistemological Preliminaries*.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 Latour, Bruno. 2007.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The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ills, C. Wright. 1959.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orris, Aldon. 2015. *The Scholar Denied: W. E. B. Du Bois and the Birth of Modern Sociolog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Shi, Shu-mei. 2018. "Linking Taiwan Studies with the Worl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aiwan Studies* 1: 209-227.